



劍橋漢學的形成與發展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at Cambridge

闕 維 民 (Que Weimin)

浙江大學歷史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劍橋漢學，由劍橋大學的漢學與劍橋所在地的漢學所組成，¹ 是英國漢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有學者認為近幾十年來英國漢學是如何地受到「出奇的漠然」² (Singular Listlessness)，但仍然不斷有著述關注劍橋漢學，它們分別是以歐洲漢學研究為背景的敘述、³ 以英國漢學為背景的簡論、⁴ 全面介紹劍橋漢學研究的文章⁵ 以及中國學者利用劍橋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漢學資料所撰寫的學術論文。⁶ 此外，作為劍橋漢學研究重要學術成果之一的多卷本《劍橋中國史》，已有數卷漢譯本問世，也有一些編譯稿和評述，其中第十卷《劍橋中國晚

清史》倍受中國學術界的關注，其評述文章有的側重於文化觀，有的注重傳統文化的雙重影響、經世致用的歷史地位和傳教活動及其文化影響，也有的強調檔案利用與晚清史研究。

上述著述比較廣泛地展現了劍橋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但可能由於種種原因，在涉及劍橋漢學發展的歷史過程方面，尚未完整有效地分析和利用劍橋大學檔案文獻中有關的漢學的資料；尤其是中國學者有關劍橋漢學的撰述，並未以劍橋大學的歷史檔案文獻⁷ 為基礎，

-
- 1 劍橋大學是英國主要的漢學研究中心之一（有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和大英博物館等漢學重鎮），但座落於劍橋的李約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是獨立於劍橋大學之外的一個漢學研究機構，所以「劍橋大學漢學」與「劍橋漢學」非同義詞。
 - 2 T.H. Barrett,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
 - 3 Herbert Franke: "In search of China: s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in Ming Wilson & John Cayley eds. *Europe Studies China*, London, 1995)。
 - 4 同 2。
 - 5 David McMullen: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 — wide-ranging scholarship from a doubtful start", *The Magazine of the Cambridge Society*, No. 37, 1995-6, p. 62-66；Charles Avlmer, "Sir Thomas Wade and the centenary of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 (1888-1988)", 《漢學研究》，1989 年 12 月，第 7 卷第 2 期，第 405-422 頁。
 - 6 王慶成〈英國起草的「中日北京八條」及與正式本的比較〉，《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第 79-85 頁；王慶成〈從劍橋大學收藏的劉麗川告示論太平天國與上海小刀會起義軍的關係〉，《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第 1-15 頁。
 - 7 劍橋大學的基本檔案文獻在劍橋大學圖書館至少藏有兩套，基本書庫和閱覽室各一。但以圖書館主樓塔書庫第四層所藏最全，本文即以此藏為準。主要有以下四種：（1）《劍橋大學報告》（*Cambridge University Reporter*），不定期校刊，第一期始於 1871 年 10 月 19 日。1876 年 3 月 17 日第 148 期的 328-329 頁，第一次出現有關設立中文教授職位的報告。（2）《劍橋大學布告》（*Ordinance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一般每三年一卷，但並非定期，1882 年創刊，1946 更名為《劍橋大學布告與規章》（*Statutes and ordinance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3）《劍橋大學年鑒》（*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往往敘述有餘、考證不足。⁸ 有鑑於此，本文即以《劍橋大學報告》等劍橋大學檔案文獻為基礎，結合其他相關的英語文獻，對有關劍橋漢學的幾個問題略作剖析，以就教於同好。

壹◎十九世紀英國漢學的崛起是劍橋漢學產生的歷史背景

劍橋漢學的產生，有其深厚的歷史基礎，從總體上講是十九世紀英國漢學研究迅速發展的必然產物；具體地講，是劍橋學人與中國的聯繫不斷增多、對中國的認識逐漸積累的必然結果。

十八世紀末以前，英國朝野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風情幾乎沒有什麼直接的認識。自英國政府於 1793 年派遣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特使訪華以後，中英兩國的交往才開始逐漸頻繁。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時，中英兩國於 1842 年 8 月 29 日簽訂了不平等的《江寧條約》（即《南京條約》，其中有「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與英人通商」（第二款）和「在五口任命英國總督或領事」（第三款）的條款，1858 年 6 月 26 日簽訂的不平等中英《天津條約》中，又寫入了兩國互派使臣駐京的條款，逐步建立起中外交使領制度。隨著

英國在華勢力的逐漸增強，英國的漢學研究也後來居上，並於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迅速崛起為歐洲漢學的一支生力軍。

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的法文《漢學文獻目錄》⁹ 是 1924 年之前西方漢學文獻的權威目錄，共輯錄 16 世紀至 1924 年以歐洲語言著述的漢學著作、印刷品和文章共 70,000 餘種，幾乎涵括了 1924 年以前西方漢學研究中所有專題的必備文獻。該《漢學文獻目錄》在第四卷和增補卷的卷末，列有目錄，但未備索引，查閱較為不便。1926 年，中國漢口圖書館在該館編制的《中國文獻目錄》中曾附錄了一份《漢學文獻目錄》的簡明索引，共 14 頁。¹⁰ 此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於 1953 年又編制了一份詳細的《漢學文獻目錄》索引（油印本），共 84 頁，並從法文翻譯成英文，滿足了以英語為國際通用語言的廣大讀者的查閱需求，雖然此份《索引》一直沒有正式出版，但它在西方國家的各大圖書館中均有所藏，劍橋大學圖書館還將此書與《漢學文獻目錄》列為同一編號，事實上已經成為《漢學文獻目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為了研究西方漢學的需要，中國學術界於 1938 年（北平）和 1966 年（臺北）曾有過兩次重印。

據美國哥倫比亞圖書館的《漢學文獻目錄》索引》

Calendar），每年一卷，創刊於十八世紀末。（4）《劍橋大學與學院學生手冊》（*The student's handbook to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s of Cambridge*），每年一卷，創刊於十八世紀末，自 1967 年起，更名為《劍橋大學手冊》（*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Handb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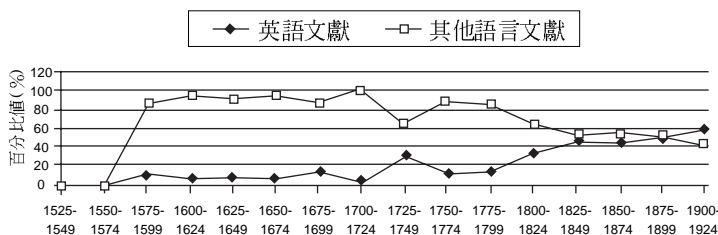
- 8 現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麥大維於 1975 年編著的《漢學資料研究服務中心系列叢書》的第 34 種《漢學文獻索引》（D.L. McMullen Ed. *Concordances and indexes to Chinese texts, 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 Occasional Series: 34*, San Francisco, 1975），是劍橋大學圖書館基本藏書，館藏書號為 FB.21.53，存放在中文部底層架書庫。張國剛譯為《中國文獻工具書》（張國剛〈劍橋大學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 年，第 3 期，第 2-8 頁）；王小甫說「我在劍橋大學圖書館都沒有查到這本書（王小甫，〈對〈劍橋大學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一文的補正〉，《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 年第 10 期，第 20-24 頁）；張國剛認為「在劍橋大學圖書館裡沒有找到這本書，當另有其他原因。」（張國剛，〈關於劍橋大學中國學研究的若干說明〉，《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 年 3 期，第 22-27 頁）未知兩位先生在敘述此著前，是否真正閱讀過此著？
- 9 高第的《漢學文獻目錄》，最初陸續出版於 1878 1879 1881, 1883 1884 和 1885 年，該著的頁面排版為一頁兩列，當時的目錄容量達 1408 列（column）（"Preface",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I.），即 704 頁。1904 至 1908 年的第二版增補至四卷，1922 年至 1924 年又出版了增補卷，在此後的其它文獻中，一般稱為「二版五卷」。[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e & Americaine, Vol.I (1904) (col. 1-763), Vol.II (1905-1906) (col.-1574), Vol.III (1906-1907) (col.-2379), Vol.IV (1907-1908) (col.-3252 with "Table des Matières" for Vol.I-IV), Supplément et Index (1922-24) (col.-4439; with "Table des Matières" for Supplément et Index)]。
- 10 漢口圖書館編《高第〈漢學文獻目錄〉索引》，漢口，1926 年（Hankow Club, Library, *Bibliography of China, being a rough index to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Volumes 1-4428* Hankow, 1926 14p.）（Its "China Class." Appendix vii.）。



統計，從十六世紀至1924年，西方漢學家共有7,737位，其中113位至少發表或出版了20篇（部）以上論文（著作），筆者稱他們為多產西方漢學家，其中英國為37人，法國29人，德國12人，美國9人，其他國家7人，不明國籍者19人。而在所有37位英國高產漢學家中，僅有2位逝世在1850年之前、6位逝世於1925年之後，他們的在華期間和漢學研究最佳年齡階段在十九世紀的佔極大多數。這一事實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說明，十九世紀的英國漢學研究隊伍，已經成為左右西方漢學研究的主導力量之一。

據高第《漢學文獻目錄》，十九世紀以前的漢學文獻極大多數為非英語著述，自1800年，特別是1850年之後，英語漢學文獻量激增，這一現象可以從《漢學文獻目錄》〈通論著述〉一章的英語文獻在所有語種文獻中所佔百分比值的歷年變化中得到證明。其圖表如下：

高第《漢學文獻目錄》〈通訊著述〉中英文文獻歷年所含百分比值



上述英國高產漢學家人數與英語漢學文獻歷史百分比值的兩項統計結果，明確而量化地反映出英國漢學在十九世紀迅速崛起以及在西方漢學界所居重要地位的歷史事實。這是劍橋漢學產生的兩項重要歷史背景。

貳● 劍橋駐華外交官員與入華傳教士是劍橋漢學的正史根基

劍橋學人與中國的歷史聯繫，從筆者目前所閱的材料看，最早可上溯至十九世紀初的曼寧（Thomas Manning, 1774-1840）。曼寧畢業於劍橋大學凱厄斯（Caius）學院，獲數學碩士學位，從1798年起，他開始嚮往神秘的中國。在耶穌教徒中，曼寧是具有科學學位的物理學家，因此被教會推薦並派往中國去觀見清朝的嘉慶皇帝，但1802年簽訂的英法《亞眠條約》（Treaty of Amiens），使他被陰差陽錯地派往已與英國和協的法國，從而完全中斷了漢語學習。幾年之後，英法再度交

惡，曼寧被拿破崙准許自由離開法國，終於使他有赴中國圓夢的機會。當他於1806年從海路抵達廣州時，卻被拒絕入境，最後只能顧人帶路進入西藏並見到了達賴喇嘛，1817年曼寧也曾作為由阿美士特使率領的英國訪華特使團的成員，以外交官員的身分訪問北京。回英後，他以其奇特的處世行徑獲得了聲譽。雖然曼寧沒有寫過任何有關中國的學術著述，但他的西藏探險日誌卻得到妥善保存並出版發行。該日誌反映出他在他所生活的時代裡是一個很有遠見的人，但他的一些觀點和認識卻不為他的國人所欣賞。他沒有出版研究中國的著述，可能是他領悟了一句漢語名言：世人皆醉我獨醒。他曾經想開通中國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之間經過不丹王國的商貿之途，但沒有成功。曼寧不是最優秀的英國漢學家，卻是十九世紀初期知名的英國漢學家之一。

英國駐廣州領事的首任領事李太郭（George Tradsent Lay, 1800-1845），早年是劍橋的一位家庭教師。精通拉丁語、西臘語和希伯來語，據說還學過醫學，一度想從醫，還會參與了音樂百科全書的編輯工作。1825-1828年，他以自然科學家的身分，參加了一支環繞太平洋地區的探險隊，第一次接近中國沿海一帶。由於善長東方語言，他被推薦為英國聖書公會（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東亞代理人，1836-1839年被派往澳門學習中文，回國後出版了《中國人寫實：他們的道德、社會與文字特徵》一書。此書的出版，加之他較強的漢語口語能力，遂於1841年被任命為英國赴華特使璞查鼎的翻譯，並成為英國駐廣州領事館的首任領事，以後又於1844年7月和1845年7月分別被任命為福州領事和廈門領事。

十九世紀英國駐華領事官員的錄用和任命制度，是逐步完善的。在最初的1843-1860年，各級領事官員無須考試即可被任命錄用。自1861起，則須經競爭考試，擇優錄取。被錄取後的考生即轉為駐華公使館的翻譯學生，然後須經兩年的漢語學習合格後方可接受任命的。但考試生員來自多種推薦途徑，其中也包括由劍橋大學推薦的考生，如瓊斯（E.D. Jones, 1838-1882）、阿赫伯（Herbert James Allen, 1842-1942）和阿連壁（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 1844-1920）等人。其中阿赫伯先後被任命為淡水署理領事（1873年）、蕪湖領事（1877年7月）、鎮江領事（1878年3月）、營口領事（1879和1881年）；阿連壁先後被任命為鎮江署理領事（1868



年 8 月)、鎮江領事 (1873 年)、營口領事 (1880 年 7 月)、北海領事 (1886 年)、九江領事 (1887 年 12 月)、煙臺領事 (1891 年) 和福州領事 (1895 年 12 月)。

劍橋城內外分布著許多中世紀的教堂，劍橋大學的每一所年代悠久的重要學院內，都建有禮拜小教堂，宗教氣氛十分濃厚，歷次宗教運動都很有影響，被人總結為「劍橋運動 (Cambridge Movement)」，其中「劍橋七教士」(Cambridge Seven) 運動與十九世紀末的中國有著直接的聯繫。

自 1807 年倫敦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傳教士馬禮遜 (Robeyt Morrison, 1782-1834) 入華傳教以後，在十九世紀派遣教士入華的英國各教會組織已多達 20 家。隨著英國在華勢力的增強，英國在華教會勢力範圍也隨之擴大，逐漸從沿海向內地拓展。到十九世紀八〇年代，英國在華教會勢力範圍的擴大與傳教士人數的不足構成了強烈的反差，於是，在英國國內掀起了一場向中國選派年青傳教士的全國性宗教運動，這場宗教運動在劍橋大學顯得尤其狂熱，以「劍橋七教士」達到高潮，成為全英國的楷模。

所謂「劍橋七教士」運動，是指 7 位年青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 傳教士於 1885 年 2 月從劍橋出發赴中國傳教的一次重要歷史事件。為了歡送「劍橋七教士」，1885 年 2 月 2 日在位於劍橋市中心的市政廳大樓 (Guildhall) 舉行了歡送會，2 月 4 日又在倫敦市中心著名的斯特蘭德 (Strand) 大樓的埃克塞特大廳 (Exeter-hall) 舉行了倫敦歡送會，《劍橋評論》、《劍橋大學編年志》和《泰晤士報》等報刊雜誌對此都作了詳細的新聞報導。五十年乃至一百年以後，這場運動的影響力仍然未衰，並有紀念著作問世。7 位年青傳教士的姓名是：章必成 (Montage Harry Proctor Beauchamp, 1860-1939)、蓋士利 (William Wharton Cassels, 1859-1925)、何斯德 (Dixon Edward Hoste, 1861-1946)、普洛希爾—特納 (Arthur Twistleton Polhill-Turner, 1863-?)、普洛希爾—特納 (Cecil Henry Plohill-Turner, 1860-?)、司米德 (Stanley Peregrine Smith, 1861-?) 和斯塔德 (Charles Thomas Studd, 1860-?)。其中除何斯德畢業於非劍橋大學的皇家軍事學院外，其餘 6 人均畢業於劍橋大學。

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分析，在劍橋漢學產生之前與中國有聯繫的劍橋學人中，除極少數外 (如畢業於劍橋大學的皮納爾 (James Pears Napier, 1848-1935) 曾為侵華

海軍艦長)，以駐華外交官員和入華傳教士為主。這一結論也在劍橋大學前三任漢學教授的身分上得到了顯而易見的印證，第一任威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與第二任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 為英國駐華外交官員出身，第三任慕阿德 (Arthur Christopherr Moule, 1873-1957) 出生於中國杭州，是劍橋入華傳教知名世家的成員之一。因此，劍橋漢學的誕生，是在十九世紀英國漢學隨著英國在華勢力的增強而逐漸成為西方暨歐洲漢學主流的歷史背景下，由退休的英國駐華外交官員創建，並由退休的入華傳教士繼承和鞏固的。

參● 劍橋大學首任漢學教授威妥瑪 是校方內定的名譽教授

劍橋漢學的產生以劍橋大學設置漢學教授職位作為標誌，其設置過程以及歷任漢學教授的任免，均有劍橋大學的檔案文獻記錄。

劍橋大學首任漢學教授職位設置於 1888 年，但早在 13 年之前，此事就已經列入劍橋大學校董事會的議事日程。1875 年 5 月 13 日，校董事會建議東方研究院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討論劍橋大學的學科建設問題，經過調研，東方研究院於 1875 年 11 月 6 日提交了一個方案，認為應該考慮設置敘利亞語、古埃及語和漢學的教授職位。

1887 年 12 月 12 日，校務委員會作出了在東方研究院設置漢學教授職位的決定，並制定了相應的 5 條規則：1. 該教授職位稱漢學教授職位，被選漢學教授自獲選日起即開始工作；2. 漢學教授的職責是講授漢語原理，在校內倡導學習漢語與中國文學；3. 漢學教授所屬的專業研究會是「東方研究專業委員會」；4. 漢學教授職位不能由本校其他教授兼任；5. 除校方另有規定外，漢學教授沒有薪水。

1888 年 3 月 24 日，劍橋大學副校長泰勒 (C. Taylor) 公布：漢學教授的選舉日期定在 4 月 21 日星期五，地點在聖·約翰學院會議室。1888 年 4 月 21 日又公布選舉會一致推選威妥瑪爵士為漢學教授的決定。就這樣，以威妥瑪獲選擔任首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為標誌，劍橋漢學於 1888 年正式宣告形成。

乍看上述檔案材料，劍橋大學首任漢學教授的選任



似乎是通過一系列的決議和程式而公開競爭產生的，但檢閱其他檔案，情況並非如此。1897年6月7日，劍橋大學校務會在其公布的有關漢學教授職位的報告中，回顧了首任漢學教授的設置經過「1887年，校務會通報董事會，威妥瑪爵士將無償地擔任漢學教授一職；校務會建議應當設置漢學教授一職，首任教授將實行終身制。這一決定於1888年2月9日制定，威妥瑪爵士隨即擔當此職直至1895年逝世為止」。此報告披露了劍橋大學在選舉第一任漢學教授之前，校方早已內定由威妥瑪出任的事實。

再分析1887年公布的有關漢學教授的5條規則，雖然第1至第3條適用於所有競爭者，但第4條排除了的大學在校教授兼任漢學教授的可能性，而第5條則完全是為威妥瑪設立的，試想，當時有誰能有威氏這樣的條件和身分，既具備較高漢學造詣又無需薪水報酬的退休高級駐華外交官？在如此苛刻的條件之下，首任漢學教授自然惟威氏莫屬了。

威妥瑪，1818年8月25日生於倫敦，韋德(Thomas Wade, ?-1846)上校之子，家中排行老大。1832-1837年，受教育於哈羅(Harrow)和劍橋大學的三一(Trinity)學院，1938年11月2日成為英軍81步兵團的掌旗手，1839年為第42步兵團掌旗手，參加了侵華的鴉片戰爭，1841年11月16日升為尉官，服役於第98步兵團，並第一次有機會接觸漢語。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後，威氏被任命為英國駐香港軍隊的翻譯。1847年6月22日，威氏退伍從政，旋即任館漢文副使。1852年升任上海領事館副領事，1855年7月6日被任命為英國駐香港漢文正使，1862年1月27日被任命為香港駐中國公使館漢文正使兼翻譯，1864年6月23日至1865年11月30日，以及1869年11月2日至1871年7月22日，任英國駐華署理公使。1871年8月1日至1876年11月6日，以及1879年6月29日至1882年8月14日，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威氏在擔任英國駐華外交官期間，編輯了漢語學習教材《自邇集》作為英國駐華使館翻譯學生的漢語教材，並翻譯(漢英、英漢)了大量的中英官方文件。1876年9月13日，又與李鴻章簽訂了中英《煙臺條約》。威氏無論是作為英國侵華軍隊的下級軍官，還是作為英國駐華的高級外交官員，他的漢語天賦、漢學研究以及悉心收集的漢籍資料，在主觀上是為英國在華謀利而效勞，但在客觀上卻成為劍橋大學

漢學研究的肇始。

威氏於1883年7月1日卸任英國駐華公使一職，旋即返國定居劍橋，隨身帶回了大量在中國收購的漢籍。從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威氏未發表的信件檔案中可知，威氏早在1877年即有意將漢籍捐贈給母校，但直到1886年底才正式完成此願，不過劍橋大學圖書館保存威氏所捐圖書的庫房鑰匙仍由威氏保管。在捐贈圖書的同時，威氏於1886年10月11日給劍橋大學副校長寫了詳細的說明信，1886年11月3日劍橋大學圖書館還專為接收此捐贈向校方提出了4條建議：(1)校方應當感謝威妥瑪爵士捐贈的珍貴漢籍；(2)將此批捐贈登記入編為校園圖書館藏書；(3)授予威妥瑪爵士館藏漢籍榮譽負責人稱號；(4)除了透過圖書館董事會與捐贈者的安排，所捐漢籍沒有校方的准許不得出借。1888年11月25日校務會隨即批准了圖書館董事會第(2)、(3)、(4)三條建議，並將第(1)條建議升格，授予威氏劍橋大學榮譽博士稱號。至此，校方已為威氏出任漢學教授一職鋪平了道路。由於威氏當時在英國的聲望很高，因此《學術》雜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雜誌》及《泰晤士報》等分別就此消息刊登了報導。

然而，威氏的首任漢學教授一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榮譽性職位，並沒有多少實際的教學研究任務。從1888年4月21日任命起至1895年7月31日逝世止，據說學生不到二、三名。據劍橋大學檔案記載，僅有1894年11月3日在王子學院禮堂舉行的一次題為「中國、朝鮮和日本：遠東局勢」的全校性講座。而第二任教授翟理斯在其長達35年任期的前兩年(1898年1月至1899年12月)的四個學期內也僅有7名研習漢學的學生。可見萬事開頭難，當初的劍橋漢學堪稱舉步唯艱。

1897年6月7日，校務會討論了漢學教授的繼任問題，希望有其他的傑出漢學家以同樣的條件繼任該職，繼任規則仍然有5條，與1888年12月12日制定的5規則相比，第1、第3和第5條規則不變，第2條在原有規則的基礎上，增加了「……，但1885年6月18日校務會制定的對於本校教授的一般規定，不適用於漢學教授。」第4條規則改為「漢學教授職位不能由本校或任何外校的其他教授兼任」。

由於暫時沒有找到合適人選，故副校長希爾(Alex



Hill) 於 1897 年 11 月 1 日公布漢學教授一職暫時空缺。1897 年 12 月 3 日翟理斯正式出任此職後，劍橋大學漢學教授一職的空缺狀況才告終止。

肆 ● 劍橋大學漢學的研究特色是 「中國語言與歷史」

自威妥瑪首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後，獲聘為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的漢學家迄今為止共有 8 位。歷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姓名及其任期與待遇如下表所示：

劍橋大學歷任漢學教授任期與待遇表

漢語姓名	英文姓名	名稱	任期	工資待遇(英鎊/年)
威妥瑪	T.F.Wade	漢學教授	1888.04.21-1895.07.31	0 00
翟理斯	H.A. Giles	漢學教授	1897.12.03-1932.12.06	200
慕阿德	A.C.Moule	中國語言與歷史教授	1933.05.26-1938.09.30	1000
哈隆	Gustav Haloun	中國語言與歷史教授	1938-10.03-1951	1000、1150
蒲立本	E.G.Pulleyblank	漢學教授	1953.10.01-1966.11.21	1950
崔瑞德	D.C.Twitchett	漢學教授	1968.10.01-1981	?
杜德橋	Glen Dudbridge	漢學教授	1985-1988	?
麥大維	D.L.McMullen	漢學教授	1989—	?

引人關注的是，「漢學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 的名稱在第三、第四任時曾稱「中國語言與歷史教授」(Professo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istory)。但無論在西方漢學還是在中國學術界，均有忽視這一細節問題的現象，如英文原版科茨 (P.D. Coates) 的《駐華領事——英國領事官，1843-1943》一書附錄二〈歷年駐華領事館

任職成員表〉¹¹ 中有關翟理斯從駐華外交官退休以後的生平即記載為「劍橋大學漢學教授」。又如張國剛〈劍橋大學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¹² 一文，稱慕阿德述為「中國學教授阿·克·穆爾」，又稱哈隆為「漢學教授」。探討劍橋漢學的歷史與發展，也應當留心這一重要細節。

1952 年 10 月 13 日公布的劍橋大學「校務會關於延續中國語言與歷史教授職位報告」中指出，牛津大學的漢學教授在講授中國語言與文學時特別地述及宗教與哲學。倫敦大學的漢學教授一職與中國藝術與考古相關，而劍橋的「漢學教授」所側重的是中國語言歷史。這一簡潔的陳述點明了牛津、倫敦和劍橋三地漢學研究各自的特色。顯然，劍橋「漢學」的內涵不局限於「中國語言與歷史」，卻又以「中國語言與歷史」為核心。而劍橋大學「漢學教授」曾稱「中國語言與歷史教授」的現象，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反映了劍橋漢學有別於英國其它漢學研究中心的這一研究特色。

劍橋大學漢學研究的內涵，主要包括漢語語言研究和中國歷史研究，這從劍橋大學歷任漢學教授的學術研究成果上可以得到比較客觀的反映，例如：威妥瑪的主要著作是《語言自邇集》、¹³ 《文件自邇集》¹⁴ 和《漢字習寫法》；¹⁵ 翟理斯的代表著述是《英漢字典》、¹⁶ 《字學舉隅》¹⁷ 和《嶺山筆記》；¹⁸ 慕阿德的主要論著是《1550 年之前中國的基督教徒》、¹⁹ 《中國景教》²⁰ 和《行在所》(杭州)；²¹ 蒲立本有《中國史與世界史》²² 和《安祿山叛亂的背景》²³ 等著述；崔瑞德著有

11 錄附一「英國駐華領事館」(Appendix I: British Consular Establishments in China)，附錄二「歷年駐華領事館任職成員表」(Appendix II: Chronological List of Members of the China Consular Service)，(P.D. Coates, *China Consuls —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89-542)。

12 張國剛〈劍橋大學中國學的正史與現狀〉，《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 年，第 3 期，第 2-8 頁。

13 T.F. Wade, *Yu-yen tzu-erh: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London, 1867.

14 T.F. Wade, *Wen-chien tzu-e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 London, 1867.

15 T.F. Wade, *Han tzu his hsien fa: a set of writing exercises, designed to accompany the colloquial series of the tzu erh chi*, London, 1867.

16 H.A. Gile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Vols 1-3), London, 1892 (Vols 1-2), 1912.

17 H.A. Giles, *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 Shanghai, 1874.

18 H.A. Giles, *Adversaria Sinica*, Shanghai, Messrs. Kelly & Walsh Ltd. 1914.

19 A.C. Moul,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 1930.

20 A.C. Moul, *Nestorians in China: some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 Sinological Series No. 1, The China Society, London, 1940.

21 A.C. Moul, *Quinsai, 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22 E.G. Pulleyblank, *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23 E.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1966.



《唐代的官方史文書》²⁴ 《中世紀中國的印刷與出版》²⁵ 並參與主編《劍橋中國史》；杜德橋撰述有《西遊記》、²⁶ 《李娃的傳說》²⁷ 和《妙善傳記》²⁸ 等著；現任漢學教授麥大維先後編著了《漢學文獻索引》²⁹ 和《唐代的州與學者》。³⁰ 具體而言，劍橋大學前兩任漢學教授主要研究漢語語言，後幾任則偏重於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唐代史研究。

伍● 劍橋漢學的學術地位穩固 於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中期

劍橋漢學的地位並非伊始即穩，而是經歷了較長的漸進過程。衡量劍橋漢學地位的穩固程度如何，可以從多方面加以考察，而其中一個比較理想的量化指標，即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的報酬金額。筆者認為，歷屆漢學教授職位所得的薪資額及其增長幅度，以及與其他教授職位工資額的的差距比較，能夠從一個側面比較確切地反應劍橋大學漢學地位的穩固程度。

據《劍橋大學年鑒：1899-1900》中〈教授職位〉一節記載，共有 38 類學科的教授職位明確載有年薪資數額，最高額教授職位為神學、考古學教授（1,000 英鎊），最低額為希伯來語教授（40 英鎊），漢學教授僅為 200 英鎊，排名倒數第三位。³¹

據《劍橋大學年鑒：1933-1934》中〈大學教職——1 教授職位〉一節記載，在幾十種教授職位中，共有 13 種教授職位有年薪資記載，中國語言與歷史教授以年薪資 1,000 英鎊列倒數第一，但其餘均為 1,200 英鎊，差距不大。³²

分析上述兩項劍橋大學各學科教授職位年薪的記

載，可以判定，劍橋漢學自產生後的 50 年內，在劍橋大學各學科中始終不佔主導地位，但與其他學科的差距在逐漸縮小，至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中期，其差距已不太明顯。據此說明，在前三任漢學（中國語言與歷史）教授的前後努力下，劍橋漢學在劍橋學術界的地位至其時才趨於穩固。

陸● 劍橋漢學文獻資料庫以劍橋 大學圖書館中文部為核心

作為歐洲暨英國漢學研究中心之一的劍橋，有其豐富的漢學文獻資料庫藏。其主要有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部、劍橋大學東方研究院圖書館、李約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東亞科學史圖書館、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以及劍橋大學相關院系圖書館。其中以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部為核心。

目前的劍橋大學圖書館大樓，建造於 1934 年，其主樓塔是劍橋市區最高的建築，中文部設於東亞閱覽室（East Asian Reading Room）或稱奧依館（Aoi Pavilion），該館由日本商人投資並在圖書館大樓南部拓伸而建，開館於 1998 年，中文部於該年從舊址遷入此館。

劍橋大學圖書館藏史可上溯至十四世紀中期的校屬書櫃，但劍橋大學圖書館最早的一批圖書是 1416 年 3 月接受的兩批遺囑捐贈。關於中文館藏書，最早一本是於 1632 年入藏的。但有些早期中文館藏書的記載有誤，如 1853 年「猶太基督教促進會」贈送給劍橋大學圖書館一卷十七世紀的羊皮書卷，有人言其為中文手書《舊約全書》首 5 卷。此書卷現藏劍橋大學善本部，由羊皮縫製成一長卷，全長約 38 米，寬約 60 厘米，其手

24 D. Twitchett,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 D. Twitchett,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London: Winkyn de Worde Society, 1983

26 G. Dudbridge, *The Hsi-Yu-Ch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27 G. Dudbridge, *The tale of Li Wa: 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the ninth century*. London: Ithaca Press for the Board of 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1983

28 G. Dudbridge, *The legend of Miao-Shan*, London: Ithaca Press for Board of 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1978

29 D.L. McMullen, *Concordances and indexes to Chinese texts*, 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 Occasional Series, 34, San Francisco, 1975

30 D.L. McMullen,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1 "Professorships", *Cambridge University Calendar: 1899-1900*, pp.501-517。

32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Offices-1, Professorships", *Cambridge University Calendar: 1933-1934* pp.18-25。



書文句排列為豎式，自右往左共 239 列，每列 48 或 49 字，筆者從頭至尾查閱此書，在其手書 1 萬 1 千多字中，無一漢字，疑為中亞阿拉伯文字。

儘管有零星的早期入藏漢籍，但目前劍橋大學中文庫藏的基礎是 1886 年由劍橋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威妥瑪捐贈的 883 種共 4,304 卷中文著作，由翟理斯加以整理成《劍橋大學圖書館威氏文庫漢、滿文書目錄》。³³ 威妥瑪此次捐贈除漢學中文著作外，還增捐了由非華人用英、法或其它語言撰寫的漢學著作，內容包括旅行、歷史、滿、蒙和藏語言的語法和字典等等。³⁴

威妥瑪不僅捐贈了中文著作，而且還捐贈了許多中文手稿、私人信件和官方文件，至今尚未完全整理和公開。劍橋大學中文部現任主任艾超世 (C.Aylmer) 在其發表的研究論文中，已經公布和引用了其中的個別材料，如威妥瑪於「光緒捌年 (1882 年) 柒月初拾日」給「大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的「照會」³⁵ 等。又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王慶成先生於 1984 年赴劍橋大學訪問時，曾在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部查閱漢籍文獻，包括沒有公開的「未編號箱文件」，並在《稀見清世史料並考釋》³⁶ 一著中引用了 22 份館藏「未編號箱文件」。

威妥瑪的捐贈時間不僅 1886 年底一次，以後還有多次，如館藏的麥都思所編《漢英字典》，³⁷ 其扉頁有威妥瑪的字跡：「1887 年 6 月威妥瑪捐贈劍橋大學圖書館」；又如館藏馬禮遜的《五車韻府》，³⁸ 其扉頁有威妥瑪手書：「贈劍橋大學圖書館，1889 年 4 月」；再

如館藏《廈門方言——英語字典》，³⁹ 題頁有威妥瑪題字：「威氏，1873 年，作者捐贈」。上述三著的題跡說明，威妥瑪在 1886 年底首次捐贈之後，還陸續捐贈了一部分漢學書籍。

自 1898 年翟理斯整理編目了威妥瑪的首批中文捐贈後，鑒於市場上又出現了大量中文著作，圖書館及 19 位私人捐助者（包括翟理斯和威妥瑪遺孀）於 1908 年捐款設立了一項基金，專款購買中文著作共達 1,300 種，不僅填補了當時中文庫藏的許多空白，而且還獲了一些善本和珍本，翟理斯為此又編了《劍橋大學圖書館威氏文庫漢、滿文書續編目錄》。⁴⁰

1945 年二戰後不久，劍橋大學圖書館又收到了由中國南京國立圖書館、成都四川博物館等單位捐贈的一批珍貴的中文圖書與拓碑文獻。此後，即開始系統收藏中文文獻資料，至今不輟。收集到的重要中文庫藏包括近 3,000 種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善本書和敦煌史料的微縮膠卷，此外，金璋 (J.C.Hopkins, 1854-1952) 捐贈的 800 多片甲骨文，是劍橋大學圖書館年代最早的館藏文獻。迄今為止，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館藏印刷著作（最早為十二世紀）、手稿和拓碑共有 10 萬卷。目前新增的中文庫藏涉及中文目錄和分類、歷史和傳記、地理和地方史、考古學和金石學、社會科學和法律、語言、文學、哲學和宗教、藝術休閒、科學與技術等學科。並擁有中文期刊 1,000 多種，包括中國大陸各地以及香港、臺灣出版的各種中文期刊，而在東亞閱覽室開架的期刊就有 110 種。

33 H.A.Giles, *A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8)。

34 "...I have added some works by foreign hands in English, French, or other languages, of which the University Library may not impossibly contain duplicates; books of travel or history; grammars and dictionaries of Manchu, Mongolian, or Tibetan; ..." 見 1886 年 10 月 11 日威妥瑪給劍橋大學校方的一封信，《劍橋大學報告》(*Cambridge University Reporter*, October 19, 1886, p.43-44)。

35 Charles Aylmer, "Sir Thomas Wade and the centenary of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 (1888-1988)", 《漢學研究》，1989 年 12 月，第 7 卷第 2 期，第 405-422 頁。注：目前該「照會」已經轉列入電腦查詢目錄之中。

36 王慶成，《稀見清世史料並考釋》，武漢出版社，1998。

37 麥都思《漢英字典》(W.H.Medhurst,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vol.I, Batavia, 1842)。館藏號為 CRC. 84.9。

38 馬禮遜《五車韻府》(R.Morrison,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II-Vol.I, Macao, China, 1819)，館藏號為 CRB. 81.11。

39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館藏號：CRB. 87.10。

40 "Prefatory Note", H.A.Giles, *A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5。



在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部查閱 1900 年以後出版的中文文獻，極為方便，讀者可徑入書庫自行查閱；1900 年以前出版的中文文獻，入藏於閉架書庫，讀者須填寫書單交由工作人員提取。但在東亞閱覽室目錄櫃中無檢索卡片或在劍橋大學圖書館電腦查閱目錄庫中未輸入信息的館藏漢學文獻，則無從查閱。

除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部外，劍橋大學圖書館其他部門以及劍橋大學相關院系的圖書館，也都散藏著中外文漢學著述，可在劍橋大學校內聯網上查閱目錄，東方研究院圖書館的漢學文獻較其他院系相對豐富一些。鄭德坤先生於 1951-1974 在劍橋大學講授中國考古和美術時，以其字號「木扉」為名，建立了「木扉圖書館」。⁴¹筆者於 2000 年 4 月底拜訪劍橋大學現任漢學教授麥大維時，曾問及「木扉圖書館」的下落，麥教授告知該圖書館目前已不存在。但從東方研究院圖書館收藏較多中國考古與美術文獻來看（其中包括鄭德坤的自編教材），「木扉圖書館」已經併入東方研究院圖書館。

落址於劍橋的李約瑟研究所所屬東亞科學史圖書館與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雖然都不隸屬於劍橋大學，但仍然是劍橋漢學文獻資料庫的兩個集中點。菲茨威廉博物館藏有少量中國古籍和較多的歷史或考古實物，如中國玉器與青銅器。而東亞科學史圖書館的漢學藏書，內容涉及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各個方面，主要以李約瑟個人資料庫為主，包括他收集的各類剪報，其中不乏珍貴手稿。

柒 ● 劍橋漢學在西方漢學研究中 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劍橋的漢學雖然不能代表英國的漢學，更不能代表西方的漢學，但劍橋的漢學在英國乃至西方的漢學研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是劍橋漢學對西方漢學研究的特殊貢獻

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準確地講應該是威 / 翟氏 (Wade/Giles) 漢字羅馬拼音系統，因為，該拼音系統雖由威妥瑪創立，卻是由翟理斯加工定型的。

自西方漢學興起以後，中國漢語固定用詞（如地名、人名等）的漢字羅馬拼音西譯，是漢學研究的學術基礎之一。在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創立之前，曾經出現過多種多樣、甚至拼法迥異的漢字羅馬拼音系統，這些拼音系統的差異，一方面是由於西方漢學研究者各自母語的差異所造成，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各地方言的差異而導致，給後人研究漢學帶來一定的障礙。

威妥瑪在中國擔任英國駐華外交領事官員期間，編輯了《語言自邇集》⁴² 和《文件自邇集》，⁴³ 作為培訓英國外交學生翻譯 (Student Interpreter)⁴⁴ (即英國駐華預備外交官員) 的語言交往與公文處理教材。在歸納分析多種漢字羅馬拼音系統的基礎上，威妥瑪總結出自己的一套漢字拼音系統，即威氏漢字拼音系統。

繼威妥瑪創立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之後，翟理斯經過了多年的漢學研究，尤其是在中國語言文字方面的深入研究，終於編撰完成了巨著《漢英字典》，⁴⁵ 在《漢英字典》中，他承襲、修改並最後定型了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為在西方漢學界推廣和規範地運用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奠定了語言學基礎。自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以後，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在西方漢學研究的

41 麥中成〈訪鄭德坤教授〉，《明報月刊》，香港。（按：此份材料來自劍橋「東亞科學史圖書館」手稿室，為李約瑟私藏，有其手跡：“Professor of Cheng Te-Khun”，該期《明報月刊》的具體發行年、月份，因此份材料上沒有注明，故不詳，但據文中內容可知，該刊發行於二十世紀八〇年代。）

42 《語言自邇集》(Yu-yen tzu-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1867 年第一版，1886 年第二版，共三卷，第一卷為 1-8 章 (Part I-VIII)，第二卷為 3-8 章的練習作業，第三卷是附錄 1-4 (Appendix I-IV)；另附作業解答集 (Key to the Tzu Erh Chi, 1867)。

43 《文件自邇集》(Wen-chien tzu-e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 designed to assist students of the language as written by the officials of China: in sixteen papers with key, London: Trubner & Co., 60, Paternoster Row. 1867, Second Edition, Shanghai, Hongkong, etc. 1905)。

44 P.D.Coates,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1843-194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45 H.A.Giles (Ed.),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Vols 1-2, London, 1912; Vols 1-3, London, 1892。

漢語固定用詞的羅馬拼音翻譯方面，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影響了西方的幾代漢學研究者。

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不僅影響著西方漢學界，而且還影響了中國學術界。例如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末期，中國派出了代表團訪問英國，該代表團出國前印製的名單手冊上，其成員姓名的漢字拼音，即採用威氏漢字羅馬拼音。而中國於 1987 年 12 月 2 日頒發的《關於地名標誌不得採用「威妥瑪式」等舊拼法和外文的通知》，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大陸的地名標誌，至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仍然受到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的影響。

筆者認為，儘管威妥瑪創立了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但如果沒有翟理斯因編撰《漢英字典》而對之加以修改定型並推廣運用，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就不可能成為二十世紀西方漢學界佔主導地位的漢字羅馬拼音系統。故西方漢學界已明確地定義為威 / 翟氏 (Wade/Giles) 漢字羅馬拼音系統，更有甚者，直接稱此為翟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的，如《字意類集》。⁴⁶

即使中國漢語拼音系統將逐漸取代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並最終成為漢字羅馬拼音的主導系統，但目前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仍然與漢語拼音系統並行使用著，並有兩種拼音系統的索引表可供相互對換。而且，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的工具作用可能永遠無法取消，因為在二十世紀問世的西方漢學研究文獻中，充滿著大量以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為據拼寫的中國人名和地名，研讀和利用這批近代西方漢學文獻，非知威氏漢字

羅馬拼音系統不可，其理與現代學者研讀中國歷史文獻必知古代漢語如出一轍。由此可知，威氏漢字羅馬拼音系統在西方漢學界的影響之深之遠。

二、《劍橋中國史》是國際性的漢學研究成果

近幾十年來，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許多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漢學著作，有些散見於各種研究系列叢書之中，如《劍橋中國歷史文獻與制度研究叢書》(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⁴⁷《劍橋歷史政治、經濟與社會研究叢書》(Cambridge Studies in Popul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ast Time)、⁴⁸《環境與歷史研究叢書》(Studies in Environment and History)、⁴⁹《經濟與社會史新研究叢書》(New Studi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⁵⁰ 和《近代資本主義研究叢書》(Studies in Modern Capitalism)⁵¹ 等等。而有些則自成體系，主要有兩套叢書，一是李約瑟主編的《中國科技史》，一是《劍橋中國史》，而以後者更具國際性。

《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是由劍橋大學退休的第六任漢學教授崔瑞德 (Denis Twitchett)⁵² 和美國哈佛大學漢學教授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聯袂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歷史研究叢書，計畫出版十五卷。據劍橋大學出版社《1999 年亞澳太地區出版物目錄》⁵³ 以及劍橋大學圖書館網站顯示，至 1999 年底止，已出版十一卷 (第 1、3、6-8、10-15 卷)，其餘四卷 (第 2、4、5、9 (上下卷)) 待出。

46 "The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s in this Index are arranged in the English alphabetical order of their Mandarin pronunciation as romanized by Dr. Giles in his dictionary", in "Note" of A.G.Jones, *Collection of Chinese synonyms*, Shantung 1904.

47 如：David Pong, *Shen Pao-chen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Y.Wong,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Norman Kutcher, *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filial piety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8 如：James Lee & Cameron Campbell,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in Liaoning 1774-187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9 如：Robert B. Marks, *Tigers, rice, silk, & silt —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0 如：Philip Richardson,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c. 1800-19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1 如：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eds.),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2 現定居劍橋，除《劍橋中國史》外，崔瑞德還與人共同主編了《泰晤士中國地圖集》(P.J.M.Geelan, D.C.Twitchert eds. *The Times atlas of China*, Times Books, 1974) 等著。

53 *Asia, Australasia & Pacific 19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v.1998.



此外，劍橋大學的資深漢學講師魯惟一（Michael Loewe）與美國芝加哥大學的肖內西（Edward L. Shaughnessy）合著，並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劍橋中國先秦史》（文明起源至公元前 221 年），⁵⁴ 在所述內容的年

代上可與《劍橋中國史》第一卷前後銜接，填補了《劍橋中國史》在先秦史內容方面的空白，完全可以列入《劍橋中國史》的研究系列。

《劍橋中國史》各卷出版情況如下表所示：

《劍橋中國史》出版情況一覽表

卷次	標題	出版年份	主編		價格 (鎊)
			姓名	國籍與單位	
	劍橋先秦史（文明起源到公元前 221 年）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1999	魯惟一 (Michael Loewe)	英國劍橋大學	80
			肖內西 Edward L. Shaughnessy	美國 芝加哥大學	
一	秦漢帝國史（221BC-AD 200）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00)	1987	崔瑞德 (Denis Twitchett)	英國劍橋大學	100
			魯惟一 (Michael Loewe)	英國劍橋大學	
二					
三	隋唐中國史（589-906）卷上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Part 1)	1979	崔瑞德	英國劍橋大學	100
四					
五					
六	五胡政權與邊境邦國（907-1368）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1995	弗蘭克 (Herbert Franke)	德國慕尼黑大學	85
			崔瑞德	英國劍橋大學	
七	明代中國史（1368-1644）卷上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1)	1988	莫特 (Frederick W. Mote)	美國 普林斯頓大學	100
			崔瑞德	英國劍橋大學	
八	明代中國史（1368-1644）卷下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2)	1998	崔瑞德	英國劍橋大學	80
			莫特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九					
十	晚清中國史（1800-1911）卷上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	1978	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美國哈佛大學	100
十一	晚清中國史（1800-1911）卷下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1980	費正清 劉廣京 (Kwang-Ching Liu)	美國哈佛大學 美國加州大學 戴維斯分校	100
十二	中華民國史（1912-1949）卷上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1)	1983	費正清	美國哈佛大學	100
十三	中華民國史（1912-1949）卷下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1986	費正清 費惟愷 (Albert Feuerwerker)	美國哈佛大學 美國密西根大學	100
十四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卷上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1987	麥克法夸爾 (Roderick MacFarquhar)	美國哈佛大學	95
			費正清	美國哈佛大學	
十五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卷下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1992	麥克法夸爾 費正清	美國哈佛大學 美國哈佛大學	100

54 Michael Loewe, Edward L. Shaughness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劍橋中國史》是一套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漢學系列研究著作，來自英國、美國、德國、加拿大、法國、荷蘭、瑞士、澳大利亞、日本、香港、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 105 位中國歷史研究者，參加了《劍橋中國史》已出版各卷各章的撰寫工作。在作者的國籍構成中，以英國和美國的漢學研究者佔絕大多數，但也包括港、臺、大陸學者和華裔外籍學者共十多名。參加人數如此眾多、地域分布如此廣泛的各國各地區漢學研究者們，在標以「劍橋」的旌旗下共撰中國史，足以表明《劍橋中國史》學術性質的世界性，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西方漢學界一個不可否認的學術現象，即劍橋漢學論壇已不屬劍橋學人所專有。

捌 ● 劍橋漢學正在走向多元化的研究方向

劍橋的漢學研究，主要由以下四個陣營所組成：劍橋大學東方研究院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部、劍橋大學管理研究學院 (Judg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tudies) 和李約瑟研究所。

劍橋大學東方研究院集中了劍橋最主要的漢學研究力量，歷任漢學教授均屬該院。開放型的國際間交流合作是東方研究院漢學研究的特色，1999 年又規劃成立了「劍橋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⁵⁵ 劍橋大學漢學研究的史實證明，東方研究院是劍橋漢學暨劍橋大學漢學研究的傳統核心與主體。

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部以豐富的漢學文獻庫藏為其特色，學術研究力量以艾超世為軼，艾超世曾於 1977-1979 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與歷史系進修，主攻中國歷史與考古，與中國大陸學術界聯繫較多，並為中文部每年從中國大陸進口大量學術著作與期刊，中國重要的政界與學界人物訪問劍橋，必參觀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部，1999 年 10 月 22 日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與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訪問劍橋大學圖書館時，即由艾超世負責接待。

在劍橋的四個漢學研究陣營中，唯李約瑟研究所獨立於劍橋大學之外。李約瑟是中國學界甚至中國普通百姓熟知的中國國際友人，他的學術經歷及其《中國科技史》一直為中國學界所稱道，他在中國大陸的聲譽遠高於劍橋大學的其他漢學家，學界內就此現象有一些或謹慎或隨意的評論，如有學者曾如此闡述「世知劍橋李約瑟，未必知劍橋大學中文系的漢學家」。⁵⁶ 但不論評價如何，學問與聲譽，總是既相關又獨立的孿生兄弟。李約瑟研究所成立於 1983 年 6 月，包括東亞科學史圖書館，其前身是 1968 年 8 月成立的東亞科學史托拉斯 (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李約瑟研究所編有不定期出版的《李約瑟研究所通訊》，自 1987 年 1 月出刊第一期以來，至 1999 年 7 月，共出刊 18 期。⁵⁷

劍橋大學的漢學研究，曾經獲得各方捐資而設立了一些獎學金，以支持和鼓勵劍橋大學的漢學研究。1946 至 1951 年，臺灣在劍橋大學設立了每年 360 英鎊的「中國政府獎學金」，共有 8 名（其中 1946 年 3 名，1947 年 2 名，1948、1949 各 1 名，1950 年空缺，1951 年 1 名）研究漢學的外國學生獲得該項獎學金。1982 年劍橋大學獲得捐助而設立了「中國研究基金」(Chinese Studies Fund)，由東方研究院的教授出任該基金會董事長，分配基金用於頒發「中國研究獎金」及邀請來訪漢學研究學者的費用。

1997 年由臺灣「信義房地產公司」總裁周先生為董事長的「信義基金會」出資 1,500 萬英鎊，在劍橋大學管理研究院設立了「信義管理研究基金」，由此設立了「信義中文管理教授」職位，這是劍橋大學漢學研究的新陣營、新職位。「中文管理」為新創詞，尚無一部詞典或百科全書收列這一詞條，僅在劍橋大學「關於設立信義中文管理教授職位的校務會報告」中對「中文管理」研究作了如下陳述：「此研究課題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香港以及海外華人聚居地區工業與經濟發展的相關問題與管理，研究在一系列的或主要管理實踐中出現的傳統中國文化和哲學影響」。⁵⁸ 但其內涵和定義

55 《劍橋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規劃與展望》(Plans and prospects of East Asia Institute China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9)。

56 張國剛，〈劍橋大學中國學的歷史現狀〉，《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 年，第 3 期，第 2-8 頁。

57 《李約瑟研究所通訊》半年刊 (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Newsletter)。

58 "The subject combines the study of management and related aspects of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ot only in the People's



將有待其研究成果的問世方能作最後結論。

劍橋大學的漢學在 1940 年之前，一直以中國經典（如《三字經》和「四書五經」）為基礎，如歷年劍橋大學《學生手冊》所載中文入學試卷所考內容，即此證明，1940 年以後，《學生手冊》就不再反映中文考試的內容，說明劍橋大學的漢學研究從此開始脫離「四書五經」的羈絆，轉而側重歷史研究。

近年來，劍橋大學的漢學研究正呈現出專題多元化、時代趨近化的趨勢，在堅持純粹歷史研究的同時擴大研究範圍，如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劍橋大學東方研究院中文專業的宣傳冊中，已將「語言與歷史」擴述為「語言與文化」，「中國的語言與文化對於人類歷史和現

代世界的評價是極為重要的，因為中國的語言與文化體現了人類主要的累積經驗與創造性成就。」⁵⁹ 並逐漸關注與現代社會發展相關的其他研究領域，如東方研究院東亞研究所 2000 年頒發的招生廣告即題為「現代中國研究」，學生必修課題涉及「商業法、經濟管理、人文地理學和政治學」等學科，學生的畢業趨向是從事「商業、法律、新聞、金融職業或博士研究」。⁶⁰

在兩千年世紀之交時期日益呈現的全球知識經濟時代，劍橋暨劍橋大學的漢學研究已經走出壁壘深嚴的學術城堡，開始主動地接觸並融入當代國際社會，努力以其本身的學術魅力，對現實世界的社會經濟發展施加反映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學術影響。

漢學研究通訊

以海內外漢學學術機構、學校或團體為贈閱對象。

凡索贈本刊，請書明單位、機構或學校、系所之名稱、主要之研究領域及已發行的出版品等項，逕寄臺北市 10001 中山南路 20 號「漢學研究通訊編輯部」即可。

Republic of China, but also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areas of overseas Chinese settlement; 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hilosophy on the emergence of a major and successful set of management practices”, 〈關於設立信義中文管理教授職位的校務會報告〉，《劍橋大學報告》1997 年 2 月 19 日（“Report of the general boar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nyi (信義) professorship of Chinese manag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Reporter*, No. 5690 Vol.CXXVII, No. 18, 19 Feb. 1997, p. 436-437）；〈1997 信義中文管理教授與管理研究，1997 年 3 月 12 日第一號決議〉，《劍橋大學布告與規章 1997》（“Sinyi professor of Chinese management, 1997, Grace 1 of 12 March 1997”, *Statutes and ordinance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66）。

59 “the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of China are central to any appreciation of human history and the modern world, because they embody the cumulative experience and creative achievements of a major part of the human race.” 轉引自麥大維〈劍橋的漢學研究〉，《劍橋社會雜誌》1995-1996 年，第 37 卷，第 62-66 頁。（David McMullen: “Chinese Studies at Cambridge — Wide-Ranging Scholarship from a doubtful Start”, *The Magazine of the Cambridge Society*, No. 37, 1995-6, p. 62-66）。

60 “Two-year course in the fields of commercial law, economics & management, human geography or political science as applicable to China: aiming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professional careers in business, law, journalism, finance or doctoral research.”，劍橋大學東方研究院東亞研究所，「現代中國研究哲學碩士」（招生廣告），劍橋大學出版社印刷服務部，2000 年（East Asia Institut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M.Phil. in modern Chinese studies, printed by University Printing Services,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0）。